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陈平原 主编

生活的教育

陶行知

何宏玲 考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卷



生活陶行知

的教育

卷

◎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陈平原 主编
◎ 陶行知卷 生活的教育 何宏玲 考释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陶行知: 生活的教育 / 何宏玲考释.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7

(现代学者演说现场 / 陈平原主编)

ISBN 7-5329-2602-8

I. 陶… II. 何… III. 陶行知 (1891~1946) — 演说—选集 IV. G40-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66796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 965 × 1270 毫米 1/32 印张 / 11.25 插页 / 1 千字 / 251
定 价	27.00 元

总序

陈平原

按使用的功能，晚清以降的“演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二是文化传播与学术普及。前一类声名显赫，后一类影响深远；与学界同行的思路不太一样，我更关注后一种演说，因其与现代中国学术及文章的变革生命攸关。至于与“演说”三足鼎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报章书局的大量涌现，使得学者们很少只是“笔耕不辍”，其“口说”多少都在媒体或文集中留下了痕迹。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演说”，成了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生活与学问的最佳途径。于是，我决定选择章太炎、梁启超等数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演说”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与表达。演讲者“说什么”固然重要，可我更关注其“怎样说”——包括演说的姿态、现场的氛围、听众的反应、传播的途径，还有日后的“无尽遐思”等。换句话说，我希望兼及“演说”的“内容”与“形式”。

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进程关系密切，这点我很早就意识到，只是一直犹豫不决，到底

该从新式学堂的演讲课程入手，还是专注于某些著名学者的学问人生，抑或着重考察其与文体变迁的关系。1999年春，为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我构思了《“雄辩会”与“讲演团”——兼及“五四”青年的文化姿态与思维方式》一文，可惜半途而废，只留下“五彩缤纷”的论文提要和一地散钱。而从谈论章太炎避难东京时如何将那些压在纸背的政治欲望，在“讲学”中借助各种穿插，表达得淋漓尽致^①，到描述国学大师章太炎、梁启超以及新文化主将胡适、周作人，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理想，怎样分别在上海、南京、天津和北京登坛说法，讲授各自所擅长的专深学问^②；再到辨析鲁迅和胡适各自的述学文体与演讲活动的关系^③，以及综合考察性质的《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代中国文章变革》^④，我主要探讨的是：晚清以降，述学之文同样面临自我更新的使命，实现这一使命的，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等新学之士所积极从事的输入新术语、新语法乃至新的文章体式，借以丰富汉语的表达能力（这一努力，符合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一直受到学界的重视）；一是章太炎、蔡元培以及鲁迅、胡适等，面对新的读者趣味和时代要求，在系统讲授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提升了现代书面语的学术含量，为日后“白话”成为有效的述学工具，作

① 参见《学问该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话文〉为中心》，载《章太炎的白话文》（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第1—52页；此文修改后，成为拙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四章。

② 参见《学术讲演与白话文学——1922年的“风景”》，此文摘要刊2002年5月31日《文汇报书周报》，全文刊《现代中国》第三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并收入拙著《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③ 参见《分裂的趣味与抵抗的立场——鲁迅的述学文体及其接受》，《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胡适的述学文体》，《学术月刊》2002年第7、8期。

④ 本文曾于2005年4月28日在东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的“亚洲视野中的中国学”、2006年1月20日在韩国成均馆大学举行的“东亚近代言语秩序的形成与再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

出了独特的贡献。

回过头来，反省学界对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论述，有几点必须修正：第一，《新青年》同人在提倡白话文时，确实多以明清章回小说为标本，日后讲授“国语文学”，也都追溯到《水浒传》等；可所有这些“溯源”，都指向“文艺文”（或曰“美文”），而不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学术文”。第二，白话文运动成功的标志，不仅仅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①；述学文章之采用白话，尤其是长篇议论文的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白话能写“美文”，白话还能表达深邃的学理，只有到了这一步，白话文的成功方才无懈可击。第三，晚清兴起、五四后蔚为大观的演说热潮，以及那些落在纸面上的“声音”，包括演讲的底稿、记录稿、整理稿以及模拟演讲的文章，其对白话文运动和文章体式改进的积极影响，不容低估。第四，章太炎等人的讲学，与宋明大儒之“坐而论道”不同，基本上是在“哲学”、“文学”这样的学科意识中展开，每讲包含若干专门知识的传授，而后才是穿插其中的社会批评或思想启蒙。第五，在表情达意方面，文言自有其长处，但绝对不适合于记录现场感很强的“演说”；学者之公开讲演并刊行讲稿，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白话诗文，都是在用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来协助完善白话的表达功能，换句话说，都是在“赞助白话文学”。第六，创造“有雅致的俗语文”，固然“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②；可这个“口语”，不限于日常生活语言，还应包括近乎“口头文章”的“演说”。

以上简要的叙述，大致涵盖我关于“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思想及文章变革所做的探索。区区论说，不如意处仍多多。恰好，我的

①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

② 周作人：《〈燕知草〉跋》，《永日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版。

几位学生对此话题也有浓厚的兴趣，于是组织他们，选择各自熟悉且欣赏的对象，做进一步的深入探索。

之所以选择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鲁迅（1881-1936）、胡适（1891-1962）、陶行知（1891-1946）、朱自清（1898-1948）、闻一多（1899-1946）等八位作为考察对象，首先基于其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或文化名人，或学界领袖，此八人全都身负重任，一言九鼎。“演说”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对演说者的社会地位及学术声誉有很高的要求。同样一句话，不同身份的人说出来，效果就是不一样。听众之所以动不动“大拍掌”，很大程度基于对演说者的崇敬以及“前理解”。除了个人魅力，论题的选择，同样十分重要。上述诸君演说的重点，在思想文化，而不是政治动员。如蔡元培之谈论大学意义，章太炎之主张以史救弊，还有陶行知之演讲生活教育之路以及朱自清的解说诗文意蕴等，时至今日，仍有其独特魅力。

其次，还得考虑演说者的口头表达能力。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一场主宾皆大欢喜的讲演，抽离特定时空，很可能不知所云。相反，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大听众。讲演者的姿态以及讲演时的技巧，同样影响到演说的成败。不同于专业著述的条分缕析，讲演必须突出大思路，而且讲求幽默，语出惊人，这样，方才能让现场的听众不断地“拍掌”、“大拍掌”。而这，并非自然而然达成的，很可能是现代学校训练的结果。闻一多在清华、朱自清在北大、陶行知在金陵大学，都曾受过专门的演说训练。当然，最著名的还属胡适的故事——1912年夏天，胡适在康乃尔大学选修“一门极有趣的课程”，那就是训练演讲，此后，“这一兴趣对我

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①。并非每个人都像胡适那样，对演说保持持之以恒的兴趣。比如，闻一多就曾对清华的演说课程提出过批评，可最后时刻挥洒自如的绝佳表现，其实得益于其早年训练。至于鲁迅称“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②，那是作者过谦之词；据许多听众回忆，鲁迅演说时思路之奇崛、语言之幽默，让人叹为观止。能演说，有深度，论题重要，且讲稿保留下来，这样“四美兼具”的大好事，并非俯拾皆是。

再次，“演说”与“文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学问须冷隽，杂文要激烈，撰史讲体贴，演讲多发挥——所有这些，决定了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胡适等人的撰述，虽有“大体”，却无“定体”，往往随局势、论题、媒介以及读者而略有变迁。但另一方面，演说与演说者的人格、趣味以及文章体式，又是密切相关的。闻一多与朱自清性格不同，在演讲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春风化雨，一雷霆万钧；西南联大师生回忆这两人的讲课、演说以及生活逸事时，三者之间往往能够互相印证。至于胡适与鲁迅，演说一如其文章，或文化立场坚定，高等常识丰富，清朗而畅达；或自我质疑，迂回前进，千里走单骑。当然，这两种风格迥异的演说与文章，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最后，该说到本丛书的最大愿望，那就是：在某些程度上复原那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演说现场”。严格说来，所有的演讲纪录稿，都很难准确传达演说者的真实意图。章太炎晚年主编《制言》时，曾“屡戒少登演讲记录”；而弟子沈延国更是将传世的章氏演讲记录分为五类，称只有那些师“自撰讲稿”或弟子记录后“由师审正”者，方能作为研究章太炎思想的可靠资料来引用^③。至于鲁迅，更是清醒地意

① 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第58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版。

② 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参见沈延国《章太炎先生在苏州》，陈平原等编《追忆章太炎》第392—39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识到此中陷阱。查有记载的鲁迅演讲达五十多次,可收入《鲁迅全集》的只有16篇,不全是遗失,许多是作者自愿放弃——或因记录稿不够真切^①,或因与相关文章重复^②。若只是孤零零的文本,那些偶然留传下来的“演说”,自然是不尽如人意。因为,专著能够深入,教科书讲究条理,文章可以反复琢磨,演讲则追求现场效果。单纯的演说,确实不及专著或文章精深;但如果添上相关史料的考辨,使“演说现场”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原,那意义可就非同一般了。

单是阅读记录稿,你很可能觉得,绝大多数演说都是“卑之无甚高论”。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本丛书的操作,与一般意义上的“考辨”略有不同,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某一次演讲的时间、地点、听众、论题,更希望借钩稽前世今生、渲染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这样,才有可能让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甚至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只能留待读者评判了。

2006年4月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① 在《〈集外集〉序言》中,鲁迅称:“只有几篇讲演,是现在故意删去的。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这已经是大可不必保存的了。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鲁迅全集》第7卷,第5页)

② 参见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马蹄疾《鲁迅讲演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生活教育之路

——《陶行知：生活的教育》导言

1991年10月18日，邮电部发行《陶行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共两枚，一枚的图案是陶行知1937年海外之旅时在墨西哥的演讲照片，另一枚为陶行知着长衫、握手杖的全身像，背景设以陶行知的著名格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两枚邮票无疑是陶行知一生事业的形象概括，既暗示出他“生活教育”观的影响，也象征着他真诚的、投入的、滔滔雄辩的演讲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人们心中。

晚清以来，以创建新式学堂和废除科举制度为契机，中国的教育进入了活跃的变革期，不论是在具体的学制建设抑或基本的教育宗旨上，各种革新之举层出不穷。教育的这种发展状况与中国从专制政体转向民主国家的进程是一致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建设需要打破原来少数人的、精英式的教育模式，实现向所有国民的教育普及。陶行知身处这一转折的历史年代，他独创性的思想找到适时发挥的舞台，其突出的成就也成为教育史上不可避免的话题。

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陶行知，从1917年归国到1946年7月病逝于上海的三十年间，一直专心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为中国教育的发展探索道路中，他倡导了多种多样的教育实践：归国之初倡导“新教育”理念；20

年代初开展平民教育运动；然后是以晓庄师范为核心的乡村教育时期；晓庄之后，他的教育活动又被他的学生概括为五大阶段：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①所有这些运动都曾在当时发生过广泛的影响，并非刻意标新的昙花一现。初看起来，陶行知的教育运动似乎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但除了前两阶段还有对欧美新教育模式的简单模拟外，其后的活动都清晰而明确地实践着他所创造的“生活教育”的宗旨，可以说，正是“生活教育”理论的丰富内涵，赋予了教育以千变万化的不同面目。

考察陶行知的教育之路，有必要从他的生活经历说起。1891年，陶行知出生于安徽歙县山乡的农家，他少年时接受过传统私塾的简单启蒙以及乡村教会学校的一些教育，之后因家境贫寒，为求学经历了几番坎坷，幸运的是最后得入南京著名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修完本科。从他金大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所表现出的思考来看，陶行知志向高远，胸襟阔大，对国家有强烈的责任感。他阐释了对“共和”之民族国家的设想以及将会面临的“险象”，同时还声明了教育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教育实建设共和最要之手续，舍教育则共和之险不可避，共和之国不可建，即建亦必终归于劣败。罗比耳曰：“吾英人第一责任，即教育为国家主人翁之众庶是已。”故今日当局者第一要务，即视众庶程度，实有不足。但其为可教，施以相当之教育，而养成其为国家主人翁之资格焉。^②

① 方与严：《教人民起来做主人》，《纪念陶行知》，第105页，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共和精义》，《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221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后文中所引《全集》，如无特别指出，都同此版本。

就中国来说，当时并无专门的教育家，亦无专业的教育学科，若谈及现代教育，只能向国外学习和借鉴。因此，金大毕业后，陶行知选择了出国留学，虽然仅取得自费资格，他还是以“十叩柴扉九不开”的执拗取得了一些微薄的费用而成功赴美。支持他的动力是一种热烈的信念，他说：“我终生的唯一愿望是通过教育途径来建立民主共和，而非军事革命。目睹我们骤然出现的共和国的严重缺陷，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共和教育，就没有真正的共和国。”^①

从《共和精义》到《给院长的信》，贯穿如一的是“教育救国”的思路，这种以教育来养成具有现代国民观念的公民，从而实现真正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思维方式我们并不陌生，以梁启超“新民说”为代表的晚清启蒙思潮正是以此为理论基础。虽然陶行知并不曾明言他受此影响，但其中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还是清晰可见。20年代初，陶行知积极参与的平民教育运动也是鲜明地体现了这一教育宗旨。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中开始推行平民教育运动，这一运动因1919年杜威来华演讲更掀起热潮。陶行知为其蕴涵的教育平等观念大加鼓舞，信心十足地加入进来，声称“其余之二万万（引者按：当时中国不识字者）都是我们平民教育应当为他们负责的。”他相信这样能够使他们“对于人类和国家应尽之责任、应享之权利，可以多明白些。”^②平民运动当时被看做“我国教育上最有希望的一种运动和事业”，^③陶行知亦为此奔走全国，经常是“上车过

① 陶行知：《为申请利文斯顿奖学金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罗素院长的信》，转引自章开沅《平凡的神圣——陶行知》第76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平民教育概论》，《全集》第1卷，第671、670页。

③ 《平民教育概论》原文最初发表于《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4期，文后有一段“编者按”，其中有此言。

旧年，下车过新年，年年车上过，也算过新年。”^①做到了“足迹所到的地方，就是平民教育所到的地方”，^②痴心执著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陶行知确实有坚定的信仰，如他所说：“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③

1926年春天之后，渐渐严峻的军阀混战局面扼杀了民主的生机，也扼杀了陶行知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救国的理想，曾经如火如荼的平教运动很快沉寂下去。困境使陶行知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发现：“中国的根本问题，便是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因为中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他教人分利不生利……”这种教育方式使广大农村的教育长期恹恹无生气，更无从谈改变农民的生存景况。要改变这一切，必须对教育进行彻底地改造，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④ 1927年3月15日开学的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标志着陶行知乡村教育的试验开始，也标志着他独创性教育理论的开始生成。晓庄学校的出现，犹如一道耀眼的曙光照亮了中国暗沉的教育界，一时间，去晓庄参观学习者纷涌如潮，其中美国教育家、心理学家克伯屈参观后的演讲代表了人们的观感，他说：“这学校，是我这几年天天所思而想要看到的一所学校。”“我看这个学校负有特殊的使命。要研究乡村生活，用那种教育才合乎乡村需要，才能引导乡村适合现在

① 《车上过年》，《全集》第7卷，第259页。

② 《我足迹所到的地方——给文汉的信》，《全集》第8卷，第13页。

③ 《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给文汉的信》，《全集》第8卷，第41页。

④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全集》第2卷，第335、336页。

的变动。”^①此语确实道出了陶行知的理想，他力图将学校建设成为一个有着学生自治、人生探究、乡村管理、农业研究、发展生产等多种功能的场所，并以此为中心来改造整个乡村的生活。

晓庄建立起来后，乡村教育有了试验的园地，陶行知后来将在晓庄试验的教育理论教育汇集为《中国教育改造》出版，其序言称此为自己“在中国教育里摸黑路所见着的几线光明”；在另一处又说过晓庄的教育是“从野人生活出发”^②，这些喻示陶行知摒弃一切传统及外来教育模式的桎梏，以全新的角度来观照中国的教育创造。陶行知曾深刻地反省过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历史，说“1919年以来，中国教育还处在模仿外国的十字路口。他时而模仿日本制度，时而模仿德国制度，时而模仿美国制度。这种从外国搬进来的教育制度，不论它们在本国多么富有成效，经过这样照搬过来，是不会结出成功之果的。”^③因此，他决心在晓庄试验出适合中国教育情形的模式，从而便有“生活教育”理论的诞生。所谓“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在表面上看来，“生活教育”只不过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简单翻转，但两者内涵已完全不同。杜威将教育看做是最完全的现实生活，并不是为生活作的准备，他进而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把学校看做为一个典型的、纯净的、理想的社会环境，以便让学生在好的环境中受到好的影响。而“生活即教育”是将教育看做是生活固有的内容，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教育

① 1929年10月，克伯屈来晓庄参观并讲话，陶行知任翻译，后来讲稿以《克伯屈先生的演讲词》发表于《乡教丛讯》第3卷第20期。转引自《全集》第2卷，第468、469页。

② 分别见《〈中国教育改造〉自序》、《从野人生活出发》，《全集》第1卷，第3、112页。

③ 《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全集》第1卷，第610页。

的意义在于促进生活的变化，并“运用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活来改造无目的无计划的生活”。^①与“生活教育”理论密切相连的是“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即知即传”等概念，其根本宗旨是为了打碎一切伪知识和知识私有的牢笼，让所有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乡村教育的出现有近代西方的民主、平等观念对中国教育影响的因素，但它更深刻地体现了这位受欧美影响的教育家的一种本土性回归。早在1924年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之际，陶行知就脱下西装革履，穿上长袍布鞋，他说：

知行近日买了一件棉袄，一条布棉套裤，一顶西瓜帽，穿在身上，戴在头顶，觉得完全是个中国人了，并且觉得很与一般人民相近得多。我本来是中国的一个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学校生活对于我的修养固有不可磨灭的益处，但是这种外国的贵族的风尚，却是很大的缺点。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②

接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人，无疑总是被那文明的光环所吸引。然而当这种文明的光环与中国的现实相冲突时，大多数人只能幻想某种改变或者自顾自地蒙头不管。而陶行知决心清醒地面对他所生活的时代和中国的实情，对于一个拥有三万万四千万乡村人口的国家来说，其乡村教育不但是中国，

① 《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全集》第2卷，第559页。

② 《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给文溪的信》，《全集》第8卷，第40页。

而且“是远东一种伟大之现象。”^①因此，他所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不但面对了中国最大的教育难题，并且在广义的文化意义上实践出一条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的接触和结合的恰当之路。在正视中国乡村教育的问题上，没有人提出过比陶行知更深刻和有效的见解来，也正因如此，梁漱溟将陶行知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并论，同列为自己“衷心折服”的三个人，以为其在“教育界独辟蹊径，风动全国，论其业绩，固自不同”，并称说：“陶先生不可及处，他本是游学外洋，回国后做大学教授的人，竟然脱去西装革履，穿起布衣草鞋，投身乡村要和农民打成一片。”^②

在教育事业上，陶行知和他不少朋友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说：“不少朋友都到国民党政府做官去了。我是从办大学到办中学，现在则做一个小学校长。”从乡村教育运动、小先生运动，到最后创办的难童学校，陶行知始终不变地为改变底层民众的教育努力，那一身破旧的学生装和营养不良的、严肃的面容已成为他特定的形象标志。从文化活动范围看，陶行知也有一段鲜明的变化。归国之初，他任教于东南大学，后就职于中华教育改进社，主持《新教育评论》等教育界重要刊物，成为一时新教育界的核心人物之一。1927年后，至少从表面上看，陶行知远离了国内的精英文化圈，但这并不意味他就此也淡出了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而只是更多地从另一个角度来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撷取他与胡适、蔡元培交往的几件小事来加以说明。

陶行知与胡适同乡、同岁，都是杜威的学生，也曾共同致

① 《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之一斑——中国代表致送坎拿大世界教育会议报告之一》，《全集》第2卷，第358页。

② 梁漱溟：《怀念我敬佩的陶行知先生》，《纪念陶行知》，第299页。

力于新教育的推行，后来由于人生境遇不同，遂相问日疏，而彼此间仅有的几次关联却值得追溯。1931年，陶行知作诗《贺胡适先生四十岁》，云：“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着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暗指胡适在《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哪一条路》一文列举中国有五大弊病即贫、弱、私、愚、乱之事。陶行知显然不满意胡适忽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根本原因，舍本求末地将过错归于无辜的百姓，但他此时语气还较温和，谦称自己“不遑论功罪，献此逆耳诗”。^①而对胡适的普及教育观，陶行知则提出了严厉的批评。1935年胡适到香港领取博士学位，并顺便发表演说，演讲辞登报后为陶行知所见，他针对胡适所说：“东亚大陆有一个地方可以办强迫教育、普及教育的便是香港。因为香港这地方有钱，治安也好，接近外人，可借镜的地方很多。中国办新教育已经有三十多年了，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做得到普及、义务、强迫教育。我以为香港是有这资格的……所以我第一希望香港能实现为第一个义务教育的地方。”愤而驳之，称之为“亡国的教育”：

照着胡先生所指示的路线，要想办普及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治安好，三要接近外人。具有这三种资格的，在东亚大陆上只有香港，故只有香港才配领导办普及教育。好！先把中国一起变成香港，再痛痛快快地来干他一个普及教育运动吧。到那时，不消说得，文学革命的巨子是一变而为英国远东殖民地普及教育之导师了。如果香港的记者听不懂胡先生的徽州官话而把他的话语记错了，那么，我愿意跟着那位记者更正这段闲谈。^②

① 《全集》第7卷，第355页。

② 陶行知：《胡适的普及教育理论》，《全集》第3卷，第659页。